

越南使臣李文馥筆下的澳門社會

陳文源* 楊大衛**

越南儒士李文馥曾六次來訪中國，其中兩次造訪澳門，在其詩集《粵行吟草》和《鏡海續吟草》中保存了數十首在澳門的詩作，這些詩或直接描述當時澳門的社會現狀，或反映澳門的政治現實。這些詩作對更全面的認識清中葉澳門的社會狀況頗有參考意義。

李文馥是越南19世紀初著名儒臣、外交活動家，曾多次出訪中國及東南亞各國，每次出訪均有詩文結集刊行。其詩文不僅展現了當時越南的文學水準，更記錄了當時越南的邦交活動以及參訪地區的社會概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近些年，有學者開始關注對李文馥的研究，並發表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學術論文。如臺灣成功大學陳益源的〈清代越南北使詩文蠡探——以李文馥和他的作品為例〉；⁽¹⁾ 西南交通大學劉玉琨〈越南使臣與中越文學交流〉一文亦對李文馥的詩文有所研究。⁽²⁾ 但上述論著着重研究李文馥詩文的文學成就。從“以詩論史”的眼光考察李文馥詩文的史料價值，較早的有拙文〈清代越南仕官李文馥與《鏡海續吟》〉一文。⁽³⁾ 當年遊學越南，偶得《鏡海續吟》詩集，認為對清代澳門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價值，回國後即輯錄了《鏡海續吟》中有關澳門的詩作，以饗大家，但並未作更深入的探討。近年，復旦大學與越南漢喃研究院合作出版了《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為更全面地瞭解李文馥訪華、訪澳的史實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這套漢文燕行詩集中，

發現李文馥首次訪澳的詩作。因此，本文擬對李文馥在澳門活動的史實及其相關詩文進行探討，通過分析其詩文的史料價值，揭示作為域外人士的李文馥對澳門的認識。

李文馥六次來訪中國

李文馥（1785-1849），生於越南，祖籍中國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祖輩於明清之際渡海移居越南。越南《大南實錄》有其傳，其記載如下：

李文馥，字隣芝，河內永順人。嘉隆十八年領鄉薦，明命初授翰林編修，充使館，累遷禮部僉事，協理廣義鎮務，監管六堅奇，轉直隸廣南營參協。辦事多中窾，上嘉之，入為戶部右侍郎，署右參知。坐事削職，從派員之小西洋効力，又之新嘉波。尋開復內務府司務，管定洋船，如呂宋、廣東公幹。又擢兵部主事，復如新嘉波，又累如廣東、澳門公幹。歷遷工部郎中，除工部

*陳文源，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從事明清時期中外關係史與澳門史研究。

**楊大衛，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史2011級研究生，從事明清時期中外關係史專題研究。



右侍郎，兼奮鵬船如新嘉坡。公回，署工部右參知，權理京畿水師事務。紹治元年，特授禮部右參知，充如燕正使。既而以外舶來沱汎，辦事不善，案擬發兵。尋開復侍讀。嗣德元年，遷郎中，辦理禮部事務。明年，擢光祿寺卿。尋卒，追授禮部右侍郎。所著有《西行見聞錄》、《閩行詩草》、《粵行詩草》、《粵行續吟》、《鏡海續吟》、《周原禱詠》等集。文馥有文名，為官屢蹶復起，前後閱三十年，多在洋程劬勞，風濤驚恐，雲煙變幻，所歷非一輒見於詩云。⁽⁴⁾

從以上的傳記中可以看出，李文馥曾經到過諸如小西洋、新嘉坡、呂宋、廣東、澳門、北京等地。據臺灣成功大學陳益源教授統計，李文馥曾經出使外國至少有十一次，其中有六次來訪中國。每出使一個地方，李文馥皆有詩創存世。其出使中國的緣由及經歷具體如下：據《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記載，阮聖祖明命十二年，即清道光十一年(1831)正月，“清監生陳榮知縣革職，李振青及男婦四十餘人搭從商船遭風”⁽⁵⁾，泊於越南海岸。因官司問題，受到阮聖祖的高度重视。待查明真相，帝命“李文馥等乘瑞龍大船送之歸”⁽⁶⁾。《閩行雜詠》亦載有此事：因“福建，古為粵大地，且余之祖籍也”，李文馥“得命如閩，喜賦：明命辛卯夏，奉簡閩派行价，駕瑞龍大船護送失風官眷陳榮等回福建省”⁽⁶⁾。此是李文馥第一次出使中國，也算是首次踏上故土，其喜悅之情可想而知。在閩期間，同地方士紳來錫蕃、許原清、王乃斌等人私交甚好，來往唱和不少。事後輯錄刊行有《閩行雜詠》。

明命十三年(1832)冬，據李文馥《粵行吟草引》所叙：“廣東水師中營外委梁國棟、右營外委樊耀陞領兵七千人，乘戰船一艘出洋哨捕，以風故停泊於我國茶山澳。”⁽⁸⁾越南聖祖皇帝得知後，“派戶部郎中黎長名前往慰問，以牛、酒厚款之，船艘有損壞者，為之修理。”⁽⁹⁾次年，又派李文馥等人護送清朝官兵由海路返回廣東。

這一次，李文馥在廣東停留了約大半年時間。留粵期間，李文馥在好友梁釗(毅庵)的陪同下，第一次造訪澳門。事後將訪澳詩文彙集成《澳門誌行詩抄》，編入《粵行吟草》。

明命十五年(1834)，李文馥再次奉命護送遭風清朝官兵回國，《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載：

清廣東捕弁陳子龍師船遭風，投泊清葩漪碧，汎命省臣給以錢米，尋遣兵部員外郎李文馥、翰林承旨黎伯秀等乘平字型大小船護送之還。⁽¹⁰⁾

明命十六年(1835)，越南方面捕獲三名廣東海盜，按習慣引渡回籍。〈三之粵集草〉載：

粵有水匪搶掠於廣南洋兮者，獲其黨人三人。⁽¹¹⁾

是年夏，李文馥、杜俊大、陳秀穎等人“奉派出舟師送洋俘之粵焉”⁽¹²⁾。此兩次出使，著有《粵行續吟》、《仙城侶話》等。

明命十七年(1836)，越南軍艦遭風失蹤，李文馥等人奉命沿廣東沿海尋訪，首先從澳門登陸，無果，隨後前往廣州。據〈鏡海續吟敘〉載：

明命丙申秋，余皆同官奉命管駕平洋號船之粵，察訪公派遭風船艘聲息。⁽¹³⁾

此事於《清實錄》中亦有所記載：

鄧廷楨等奏，越南國遣使尋訪被風船隻(……)駛至澳門外雞頭洋面灣泊。但據該使李文馥等稱，因傳聞該國水師平字等號船隻，洋面遇風，流入粵省瓊崖等處，經該管商船官派出伊等來尋訪等語。⁽¹⁴⁾

李文馥此次粵澳之行，其詩文集就是《鏡海續吟草》。

紹治元年（1841），李文馥奉命出使北京。據《大南實錄》記載：阮憲祖“遣使如清告哀，以署工部右參知李文馥為禮部右參知充正使”⁽¹⁵⁾。此次隊伍龐大，路線較長，從廣西鎮南關入境，北上湖南、湖北、河南、直隸，於當年七月到達北京。在北京都留了一個多月後，啟程回國。次年回到越南。此次出使中國，使李文馥真正領略到中華大地的良好風光，其歌頌大好河山的詩文隨處可見。現有其〈周原雜草詠〉、〈皇華雜詠〉、〈使程遺錄〉、〈回京日程〉、〈使程便覽曲〉、〈使程括要編〉等流傳於世。

李文馥在澳門的活動

李文馥兩次造訪澳門，分別是明命十四年（1833）和明命十七年（1836）。兩次遊澳的經歷，給李文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因在廣州處理公務，停留了大半年時間，其間造訪澳門。據〈澳門誌行詩抄序〉記載：

癸丑夏，余與同官講大夫奉國命護送失風戰船來粵。八月既望，余獨以事之澳門。與南海梁君毅庵同舟往返凡五日，得詩多若干首。毅庵蓋文雅士而隱於市，比性恬和，與物無忤。自官船到此，凡事多所贊畫。至於應酬往來，固數與余晨夕矣。是行，余復與之俱。⁽¹⁶⁾

從其詩文中，我們得知李文馥此次訪粵，是由其在廣州的好友梁毅庵陪同，於八月十六日出發，前後費時五天。此次遊澳並非是來處理公務，完全是李文馥閒暇之餘攜友人一同遊玩欣賞澳門佳景。《粵行吟草》中收錄的關於澳門的詩文共有四篇，儘管時間緊促，但我們從字裡行間仍能感受到李文馥初次遊澳門的欣喜之情以及他對澳門社會的濃厚興趣。

第二次訪澳是李文馥與同僚黎瑤甫、胡養軒等人“奉命管駕平洋號船之粵，察訪公派遭風船艘聲息”⁽¹⁷⁾，其所乘官船首先從澳門泊岸登陸，並入住於葡式館舍，存有〈舟進澳口安泊登洋人樓〉。

此次訪澳，處理公事乃李氏的首務，他們先後拜訪了當時的澳門同知馬士龍與香山縣丞金天澤。

馬士龍於道光十六年（1836）出任第三十任澳門同知。李文馥在談公事之餘，嘗有詩文唱和，〈詒澳門分府馬士龍〉曰：

秋葉飛霜客思馳，春風半面為誰思。
眼前華字夷能化，足下循聲海亦知。
鎖鑰天雉無事日，琴樽司馬退衙時。
山圓水曲皆堪賞，清橐應多幾卷詩。⁽¹⁸⁾

在這首詩中，李文馥表達了個人對馬士龍的景仰之情，尤其是“眼前華字夷能化，足下循聲海亦知”一句，讓我們體會到鴉片戰爭之前，在中國政府懷柔政策的感化之下，居澳葡人欣慕中華，駐澳官員的威名深入人心。

金天澤“歷仕州縣”，但因事被貶，道光十五年出任第二十九任香山縣丞，“嘗有繫匏鏡海虛度韶光之歎”。李文馥“為官屢躋復起，前後閱三十年，多在洋程効勞，風濤驚恐，雲煙變幻。”⁽¹⁹⁾對金氏的遭遇也感同身受，遂作〈贈香山縣丞金天澤〉一詩，聊表同情與理解，詩曰：

知君揚歷到如今，纔一相逢感慨深。
鸞鳳豈終棲枳棘，匏瓜休歎繫光陰。
水紋含月開圓鏡，石皆藏雲臥碧岑。
鏡在會心何必遠，可能芝蓋共登臨。⁽²⁰⁾

在兩次訪澳期間，李文馥參觀了“城臺、倉庫、院宇、市廛”⁽²¹⁾以及博物館。其〈登洋人博物館〉一詩載：

卻怪心思巧，能令耳目憐。
 骨枯人挺立，翼斃鳥飛旋。
 風物重樓上，煙波八月天。
 紛陳奇崛意，欲問更誰傳。⁽²²⁾

李氏所參觀的應是今天大三巴地下室之博物館，此詩既有對博物館陳列品的描述，又表達了李文馥對西人高超醫學技術的讚歎。

李文馥滿腹經綸，才華橫溢，所到之處，樂於結交當地名人雅士。在李文馥四次之粵（含澳門）的詩作中，我們就可以看到許多在廣東小有名氣的文人雅士與李文馥皆有來往，如張玉堂、繆良（即繆蓮仙）、梁玉書、劉墨池、王灝、何異甫、梁釗（即梁毅庵）。在其詩集中不乏有諸如贈答唱和之作，其內容涵蓋了祝壽、旌節、出遊、納妾、珠江群英會、樓船會等諸多活動。在這些文人之中最具名氣的莫過於繆良。繆良並非廣東本土人士，他生於浙江，中年以後一直在廣東居住。繆良雖中年落魄，但在清中期文壇，尤其是嶺南文學界還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現有《蓮仙尺牘》、《嚶求集》、《嚶求集全》、《嚶求集尺牘》、《徐娘自述詩紀》等相關詩作傳世。⁽²³⁾ 在這些人中，與李文馥交誼最深的應屬梁釗，即梁毅庵。梁釗，廣東南海人。此人溫文爾雅，頗有文人豐采，李文馥譽之為在中國的“知音”、“異地之相知”。其在〈澳門誌行詩抄序〉中曰：

毅庵，蓋文雅士而隱於市，比性恬和，與物無忤。（……）顧念異地之相知，喜雅遊之。（……）聊以誌梁君與余之情。

在〈與南海梁毅庵塵談偶成一為以思無蓋不如學慎言其餘則寡有賦此答贈〉中稱許與梁的交誼之深，詩曰：

自憐踐履向未工，深垂老猶思學箴。
 良劑砭愚謨訓在，明窗對影父師臨。

情投異地遂傾蓋，交到濃辰可當金。
 什衣歸裝痕尚濕，逢人共道我知音。⁽²⁴⁾

不僅李文馥與梁毅庵交好，就連其隨行的同事也與梁毅庵結下深厚情誼。在第三次之粵期間，李文馥、杜俊大、陳秀穎等人就留下了關於留念梁毅庵的詩篇。譬如在《三之粵集草》中，李文馥有詩〈次南海故人梁毅庵見訪元韻〉、〈附毅庵元韻〉、〈次韻留別梁毅庵〉⁽²⁵⁾，追憶了與梁毅庵交往的情形，“三年交誼”使李文馥倍加珍惜。在《仙城侶話》詩集中，李文馥的〈次韻酬梁毅庵見訪〉、陳秀穎的〈次韻贈梁毅庵〉、杜俊大的〈次韻贈梁毅庵〉⁽²⁶⁾ 都表達了他們個人對梁毅庵的情感，異國情懷在這裡展現得淋漓盡致。另外《鏡海續吟草》中詩〈粵友梁毅庵舟中見過賦贈〉當為李文馥由澳門去廣州途中舟中遇到梁毅庵，故友相見，皆會賦詩留念。⁽²⁷⁾ 這些都為我們研究梁毅庵其人以及中越文人交往故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李文馥遊澳期間，不僅參觀了澳門的“城臺、倉庫、院宇、市廛”，而且還樂於與“識字”的居澳葡人交遊。〈重九後偕同事黎瑤甫、胡養軒與識字洋人泛舟零仃洋即事〉記載：

九秋海氣逼瀟森，夜影燈帆出遠林。
 杳渺雲邊三共事，啁啾隊裡一知音。
 亂山雨過齊開眼，駭浪天澄獨照心。
 信國詩魂何處弔，隔鳳松韻和潮吟。⁽²⁸⁾

此詩描述了李文馥攜越南同事與識字葡人於重陽節後出遊零仃洋之情景。“識字”即識中國漢字。“三共事”即指李文馥與同事黎瑤甫、胡養軒等三人，“一知音”即指此位“識字洋人”。但由於他的華夷觀念源自中國儒家舊有思想，而且是越南由來已久的傳統，這又不免讓他在面對西方時流露出衝突與排斥的心理⁽²⁹⁾，“啁啾”一詞即是對西人的貶稱。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讀懂這樣一條資訊，即李文馥作為傳統的封建士大

夫，既對西方文明表示出濃厚的個人興趣，但在心理上又把他們拒之於封建傳統的文化之外。

澳門設置了行政、軍事、海關等管理機構，其詩序曰：

李文馥視野中的澳門社會

鴉片戰爭前，以澳門社會風貌為體裁的詩文並不多見，而李文馥以一名外國人的視角審視澳門的社會實情，並以漢詩的形式記載下來，這無疑是極其寶貴的，對清代澳門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價值。

如前所述，李文馥分別於1833年和1836年到過澳門，其間在澳門所見所思，載於李文馥的《粵行吟草》和《鏡海續吟草》兩部詩文集中。李文馥所作的關於澳門的詩，可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寫實類，如〈以事之澳門和同舟梁毅庵二首〉、〈登洋人博物館〉、〈舟進澳口安泊登洋人樓〉、〈澳門即事〉等詩作。第二類為唱和答贈類，〈贈香山縣丞金天澤〉和〈詒澳門分府馬士龍〉即為此類。第三類為抒情類，譬如〈登鏡海神山觀音閣步鐫石元韻〉、〈中秋〉等。李文馥的詩文及序，有對澳門的政治、軍事的描述，也有對澳門繁榮貿易的讚歎；有對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等細緻入微的觀察，也有對澳門的宗教文化生活宏觀的考慮。就連“洋人濯衣皆曝於山上”⁽³⁰⁾這一現象也記載在其詩中。這些都為我們研究鴉片戰爭前澳門的社會狀況提供了最為原始的資料。

在政治方面，李文馥反復強調澳門的政治地位，認為澳門主權在中國，葡人租居而已，中國政府默許居澳葡人擁有一定的“自治權”，體現了中國傳統對外夷的“羈縻”精神。李文馥在其詩文中多次提到葡人在澳門的“租居”地位，如〈以事之澳門和同舟梁毅庵二首〉中稱：“澳門，粵之大海島，西洋人租之以居焉。”⁽³¹⁾〈澳門誌行詩抄序〉亦載：“澳門……粵之大島嶼也，西夷瑪糕等租之以居。”在〈澳門即事〉中，李文馥稱：“澳門雖屬夷居，而地仍是粵。”⁽³²⁾同時，李文馥也注意，在鴉片戰爭前，清朝政府在

唐官設有海防軍民府、前山都閫府、香山縣丞、海官稅館等衙門，畧存其羈縻而已。⁽³³⁾

羈縻之制始於中國的“五服之制”，它是中央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的一種獨特的懷柔政策。即一方面要“羈”，用軍事手段和政治壓力加以控制；一方面用“縻”，以經濟和物質的利益給予撫慰。明清政府對居澳葡人的“懷柔”表現在准許他們實施一定程度的自治，葡人在澳門擁有議事機構、司法以及軍事防衛體系。澳門乃華洋雜處之地，對於葡人社群內的糾紛與訴訟，明清政府基本聽任葡人依照其本國的習俗與法律處理。祇有涉及華人案件時，才會由中國官員審理。詩人對此審視細緻，其詩序云：

見設分府孫海關講衙門，及巡邏船艘，以備微妝訊察。其詞訟係夷洋官言之，稍涉漢人則漢官主之，蓋羈縻之意也。⁽³⁴⁾

李文馥居澳期間，亦參觀了葡人海防炮臺。⁽³⁵⁾

經濟方面，在李文馥的筆下，澳門儼然已成為一個貿易繁盛的海港城市。葡人在此“開市肆，商賈舟船多集焉”⁽³⁶⁾，且“未見星槎辭北去，每添賈舶自西來”⁽³⁷⁾，足見鴉片戰爭前澳門海上貿易之繁盛景象。在這繁榮的背後，華人擔當了特殊的角色，李文馥觀察到“澳門唐人多為夷人掌貨簿”⁽³⁸⁾這一社會現象。從葡萄牙人質居澳門開始，澳門華人就已經參與了對外貿易相關的販賣、通譯、工匠、建造等行業。⁽³⁹⁾外國人要想在澳門做生意，必須仰仗華人，因為“中國經濟狀況，與歐美大異，外商殊難瞭解；學習中國語言之困難；調查中國商人之資產信用，頗為困難，而中國商人亦難置信於外來商人；中國商場中諸習慣，貨幣度量衡等，複雜萬端，不易



通曉；中國貨幣制度，頗為複雜，品質形狀相異之各種貨幣以及票據等，隨時流通於市場，欲辯其真贗，鑒其良否，均需特殊技術，外人於此，俱為不可能之事。”⁽⁴⁰⁾ 因此葡商必須僱傭居澳華人幫其處理生意，給與傭金較為豐厚，且此工作又極為體面，因此稍有文化的澳門華人一般都願意“為夷人掌貨簿”。他們不知不覺地為澳門對外貿易的繁榮以及澳門社會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社會生活方面，澳門呈現在詩人眼前的完全是一個歐化的港口城市，所謂“城臺倉庫、院宇市廛，別成西洋一世界”⁽⁴¹⁾。李文馥〈舟進澳口安泊登洋人樓〉有語“問星人上摘星樓”⁽⁴²⁾，亦有說明樓高之意。屈大均在其《廣東新語》中對澳門的建築有過詳細的描述，“其居率為三層樓，依山高下，樓有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菓形者，一一不同，爭以巧麗相尚。”⁽⁴³⁾ 澳門城內建築盡顯歐洲風采。李文馥對居澳葡人的生活觀察入微，如“洋人濯衣皆曝於山上”⁽⁴⁴⁾，透視出葡人的生活細節。詩人也特別注意到居澳葡人的精神生活，發現澳門城裡存在“遍地皆尚耶穌，不尚佛”⁽⁴⁵⁾的現象，他第一次與梁毅庵參訪澳門時就曾發出“西去幾番勞問俗，東遊又見請超魂”⁽⁴⁶⁾的感慨。在遊澳期間，令詩人感觸最深的應是葡人的博物館，其〈登洋人博物館〉一詩記載：“西洋人最機巧，樓上百物咸備，皆取其死者裝成生樣。更有枯首人形，挺然特立。自頭至腳，骨節畢具，惟皮肉無存。”⁽⁴⁷⁾ 參觀完畢，詩人油然發出了“紛陳奇崛意，欲問更誰傳”⁽⁴⁸⁾的感慨。在面對西方先進的文明之時，詩人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對外來新鮮事物的濃厚興趣。

澳門作為東西文化交匯融合之地，有被洋化的華人，亦有部分華化的葡人。居澳葡人或是工作的需要，或為生活之便利，或是嚮慕中華文化，學習漢字，沿襲中華傳統。〈澳門諸夷有識華字者〉一詩云：

蟲作書形鳥做聲，少從學習竟分明。
鏡窻舉白稱寒舍，鉛筆簽紅寫晚生。
未果陳相能用夏，不逢宣聖孰入荊。
何年廊廟勞籌算，遺恨江湖代代鳴。⁽⁴⁹⁾

此詩不僅記錄了葡人以玻璃裝飾窗葉的傳統，還描述了其書寫習慣，“其筆以鉛灌管中削尖之”⁽⁵⁰⁾。更值得關注的是，葡人對自家居所稱“寒舍”，還自謙稱“晚生”。如果說玻璃與鉛筆代表西學東漸的“器物層次”，那麼，這種稱謂在日常交往中的運用，則代表中華文化得到了葡人的接受，屬於“精神層面”的影響。

結語

鴉片戰爭前，李文馥作為越南的使臣，兩度造訪澳門，並有一批詩文存世。從這些詩文中可以看出，當時李文馥遊澳並非“走馬觀花”式的遊玩，而是一種深度的觀察與瞭解。從澳門的政治現實、貿易景況，到居澳葡人的生活細節、精神世界，都有深入細緻的觀察，因此他對澳門的描述也是客觀真實的，對於澳門史研究而言，這些文字也成為難得的寶貴史料。當然，我們也注意到，李文馥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對“西學”的成就有着濃厚的興趣，另一方面也不時流露其文化的優越感，詩文中以“夷人”稱呼居澳的葡人，以“蟲作書形鳥做聲”來描述葡人的語言文字，充滿着鄙視與不屑。在運用這些詩文時，我們理應仔細甄別與體會。

【註】

- (1) 陳益源：〈清代越南北使詩文蠡探——以李文馥和他的作品為例〉，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陳益源教授演講稿，1997年4月28日。
- (2) 劉玉珺：〈越南使臣與中越文學交流〉，北京：《學術研究》，2007年第一期。
- (3) 陳文源：〈清代越南仕官李文馥與《鏡海續吟》〉，張玉春主編：《中國古典文獻與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論

- 文集》，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頁278-285。
- (4) 許文堂、謝奇懿：《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大南列傳正編第二集》卷25，〈諸臣列傳十五〉，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2000年，頁504。
- (5) (6) 許文堂、謝奇懿：《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卷71，〈清監生陳啟等遭風難〉，頁119。
- (7) (越) 李文馥：《閩行雜詠》，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2冊，頁215。
- (8) (越) 李文馥：《粵行吟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冊，頁7。
- (9) 許文堂、謝奇懿：《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卷88，〈清廣東巡洋師船遭風難〉，頁132。
- (10) 許文堂、謝奇懿：《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卷88，〈清廣東捕弁陳子龍遭風〉，頁158。
- (11) (越) 李文馥：《三之粵集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冊，頁236。
- (12) (越) 李文馥：《三之粵集草》，第13冊，頁242。
- (13)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14冊，頁8。
- (14) 廣東省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廣州市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編：《清實錄廣東史料》，廣東地圖出版社，1995年，第四冊，頁181。
- (15) 許文堂、謝奇懿：《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大南實錄正編第三紀》卷2，〈遣李文馥等如清告哀〉，頁222。
- (16) (越) 李文馥：《粵行吟草》，第13冊，頁82-83。
- (17)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8。
- (18)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12。
- (19) 許文堂、謝奇懿：《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大南列傳正編第二集》卷25，〈諸臣列傳十五〉，頁504。
- (20)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12。
- (21)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7。
- (22) (越) 李文馥：《粵行吟草》，第13冊，頁79。
- (23) 李靈年、楊忠：《清人別集總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2382。
- (24) (越) 李文馥：《粵行吟草》，第13冊，頁32。
- (25) (越) 李文馥：《三之粵集草》，第13冊，頁248-294。
- (26) (越) 李文馥：《仙城侶話》，第13冊，頁326-327。
- (27)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48。
- (28)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載，第14冊，頁42。
- (29) 陳益源：〈清代越南北使詩文蠡探——以李文馥和他的作品為例〉，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陳益源教授演講稿，1997年4月28日。
- (30)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14。
- (31) (越) 李文馥：《粵行吟草》，第13冊，頁76。
- (32) (越) 李文馥：《粵行吟草》，第13冊，頁78。
- (33)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7。
- (34) (越) 李文馥：《粵行吟草》，第13冊，頁78。
- (35) (越) 李文馥：《粵行吟草》，第13冊，頁82。
- (36) (越) 李文馥：《粵行吟草》，第13冊，頁82。
- (37)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45。
- (38)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14-15。
- (39) 林廣志：〈晚清澳門本土商人的崛起及其對社會形態變遷的影響〉，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七十一期(2009年夏季刊)。
- (40) 沙為楷：《中國買辦制度》，北京：商務印書館，1927年，頁3-4。
- (41)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7。
- (42)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11。
- (43) (清) 屈大均：《廣東新語》(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5年，頁36。
- (44)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14。
- (45)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11。
- (46) (越) 李文馥：《粵行吟草》，第13冊，頁77。
- (47) (48) (越) 李文馥：《粵行吟草》，第13冊，頁79。
- (49)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22。
- (50) (越) 李文馥：《鏡海續吟草》，第14冊，頁14。